

诗人教师王小妮 失望是真切沉重的,但希望还在

一位诗人,在大学课堂给年轻人讲诗,总会被人轻易认定为美好诗意之事。但从她的新书《上课记》可以窥见,现实比浪漫的想象复杂得多。

自2005年始,诗人王小妮成为海南大学教授。站在讲台上,她面对的是可寄以希望的年轻人,也是苦读多年走过高考的沧桑学子。他

们单纯热烈,是未来时代的主人翁,有纷繁的梦想与追求,也承载了此一时代的沉重。

作为一位母亲,王小妮曾经对教育现状有极深的忧虑与焦急,担心自己的孩子被损害、被无谓地消耗,担心他遭遇不必要的丧失、倦怠、困苦,担心他在齿轮螺丝钉构成的教育工厂中,被虚伪、

阿谀、逢迎等熏污,担心他来不及好好长大。

……
孩子终于还是长大了,教育并没有损伤他的正直、善良、独立自主。王小妮对未来的信任与希望正落于此:人性中蕴藏着独立意志和善。于是,尽管失望是真切沉重的,但希望还在。



【人物简介】

王小妮 1955年生,作品除诗歌外,涉及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。2000年秋参加在东京举行的“世界诗人节”。2001年夏受德国幽堡基金会邀请赴德讲学。2003年获得由中国诗界最具有影响力的三家核心期刊《星星诗刊》、《诗选刊》、《诗歌月刊》联合颁发的“中国2002年度诗歌奖”。曾获美国安高诗歌奖。现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,其“上课记”系列散文曾获首届朱自清散文奖,今年结集出版。

【手记】

坚持不成为现实的同谋

在母亲的位置上,在大学教师的位置上,王小妮看到太多与教育有关的乖谬与晦暗,她并不是一位坚定的教育理想主义者,因缘际会走上大学讲台,她准备与那些乖谬晦暗作战,亦不欲针砭其弊,而是“以纯粹个人的品质和责任对待每一个学生”,成为一个好老师。

多年来,王小妮宽和地倾听学生,努力去理解他们,关心他们,却发现自己

用心植入课堂的价值原则与底线,在学生的真实生活中常被无意识地遗忘了。似乎有一种力量,胁迫着她的学生往另一个方向走去,他们关心分数紧张考试、被学生会的权势诱惑、急功近利、屈服于物质、抱怨生活。很多次她离开教室和学生结束闲谈分手,超越一时一事的大悲哀扑向她,“这是真实的深及精神的悲哀”。而她仍努力着去发现年轻人身上最小的纯净,并

将其说出来。
现实的沮丧,是每个人参与的结果,希望,也在每个人身上。教育的效果在未来,如果能改变或触动年轻人的内心,未来的一部分亦将发生改变。王小妮没有与那些痛声疾呼教育之恶的人站在一起。她理解制度环境败坏毒害个人的能力,也为孩子们身上丧失的独立与自由伤心,终究还是相信善的力量:“他们是未来社会的根基,如果他们

能清晰设定做人的基本底线,我们或许不该放弃对未来的希望。”
在我们的采访最后,王小妮说:“我也快退却了。”她敏感善良,带着对生活对人最大的善意,努力让自己的课堂变得丰饶,期待能启发学生身上潜行向前的力量,但还是有掩不住的黯然神伤。

本版采写/本报记者 朱桂英
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价值观底线,源于生命本性

对话

新京报:你自己提到“从来没有对我以外的世界投入过热忱和主动”,那么,当你以老师的身份,站在一群年轻人面前,打开自我世界的界限,你有过倦怠吗?

王小妮:有失望但几乎没倦怠。更多是感谢,能忽然离这些年轻人这么近,从各自不同的人身上感到生命不屈从的力量。

也许一直有用文字表达不出来的东西,自己并没发觉,突然它们获得了另一条奔涌的渠道。

新京报:“有时候去上课,感觉一路奔跑着急着要

同他们交谈,一个悲观的人能在今天这么做,真是自我的拯救”,与学生“交谈”的意义,为何在你那里会那么隆重,以至于到“自我拯救”?

王小妮:这个和上个问题相关联,有衔接。默默地独自的悲观的内心能有一部分获得表述的机会,甚至可能获得理解或者认同,你在心里想来想去的某些东西能部分地向别人转述,而且,是可以寄以期待的年轻人。

写诗是一种自救,当和后来人交流时从中感受到了宽延的救赎的可能,如果是真的,多好的一件事。

每代人都需要生命的底线

新京报:1955年出生的你,在精神成长最为郁勃的年华里,遭遇的是一个错乱动荡的年代。你自己是怎样设定做人的基本底线的?在现实课堂与生活中,你会与学生分享对这底线的理解吗?

王小妮:我是对“文革”有准确记忆的见证者,写过一组小说“1966年”。在我的经历中,价值观的底线从来不属于学校教育,后来的学生们相信也如此。我更坚信它源于生命的本性。本性爱自由,本性爱同类,本性厌恶欺压告密等等。

好的老师好的课,一定带有它独有的个性气息,这其中不可能避得开价值底线。当然,这种底线的不断碰触,是自然的无处不在的,这可不是“思想品德课”。

新京报:在《上课记》里发现你对年轻一代对学生,有着难以掩饰的失望,你是怎样对待并处理这样的失望情绪?

王小妮:情绪总是在变,

失望和希望,失落和耸动,就这么纠结交错着。就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学期,有过一次深深的失望,直接在课堂上讲出来,接下来没课的一天半时间,几乎不能脱离那情绪。直到再有课,是另外一个班,进教室的时候走得很慢,看着已经到了的学生们,我发现我内心里真是很喜欢他们,虽然不是同一拨人,忽然,一瞬间就释怀了,这个书里没有,“2012年上课记”刚刚开始写,还没写到这段。

新京报:孩子们不能真实地省察自己,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与认知,对此的忧虑,在《上课记》里能找到很多。你为何看重对自己的思考与表达?

王小妮:自我是最真实真切和可知可控的,如果把自我都给丢了,人还有什么?过去,或者现在很多场合,总在强调集体,我从来就怀疑这个,没有好的真实的个体,集体不存在。

我也快退却了

新京报:你在书中提到,很多学生来自农村。这意味着他们一旦毕业,举步维艰,社会的不公平不正义,很残酷地伤害他们。作为他们的老师,你会为此感到焦虑吗?

王小妮:焦虑说重了,忧虑更准确吧。时常冒出担心,而这担心从一个个个体,渐渐汇聚成一个足够庞大的群体,这时候倒是真忧虑。

我几乎什么也做不了,想介绍一个同学到深圳的报社实习,举手之劳吧,可报社的朋友很为难,连实习一个月都是件难办的事了。我能做的也许只剩了告诉他们

春运回家“钱要贴着肉”。

新京报:你曾说,诗歌可以成为容人安居的寓所,教育可能让你安居其中产生梦想吗?

王小妮:没大目标,更没梦想,想想下两节课怎么上得比今天好点,更生动更有新意,像寻找一首诗的走向一样,短暂地享受其中。出了一间教室和一张课表,其他都是你无力去做,完全没有幻想空间的。

你看到的只是能够写出来的《上课记》,它怎么能和独自躲在诗里相比,它只能令人焦灼其中。我也快退却了。